

您的位置：比较政治研究网>教师成果

## 选举技术作为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兴起及其评析

作者：高奇琦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03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期以来，选举技术正在逐渐打破传统的政党意识形态分野，而成为西方政党所共性的新意识形态。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政党选举活动的职业化和政党组织结构商业化这三方面。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力图将实践问题化归为技术问题。本文认为，从根本而言，政党社会关系的调整不能仅仅通过技术和策略来完成，而需要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进行。政党技术统治试图消弭的实践问题，应该通过立基于交往活动之上的协商政治模式来实现。

**【关键词】** 选举技术；政党意识形态；实践问题；协商民主

**【来源】** 社会主义研究，Socialism Studies, 2009年03期

###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史历程

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中较难把握的概念。意识形态产生于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大变革。意识形态不同与传统的宗教信念。传统的宗教信念是静态的，是一种有等级结构的、一以贯之的概念体系，而意识形态则是多元化社会的产物，与服务于局部利益的竞争性群体相联系。传统宗教关系关注个人的日常生活与神圣的彼岸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则关心个人参与其中的此岸世界的公共方案。传统的宗教神话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构成了一个超越社会世界的既定框架，而意识形态则是人们自己的创造物，获自于对社会自身的艰辛研究。<sup>1</sup>

最初在哲学意义上间接讨论意识形态的思想家是培根。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蒙蔽人类理性的四种幻象：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和剧场幻象。当然，培根主要从消极意义上来讨论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首次使用则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中。创造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安东尼·特拉西（Antoine Tracy）。在《意识形态原理》中，特拉西拒绝了天赋观念的思想，而提出一种新的将成为所有其他科学基础的观念科学。这种新的观念科学来自于对人类普遍需求的理性考察，将需求构筑为法则的基本框架，并在法则的基础上调节社会，以促进人类愿望的和谐实现。在特拉西的语境中，意识形态是个积极

的、进步的概念。<sup>2</sup>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意识形态概念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也经历了理论变化的过程。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虚假的意识”来批判意识形态的概念，“在全部意识形态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认为其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和真实动机。<sup>3</sup>在其后期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即任何一个社会所具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在这里，意识形态是作为同经济形态和物质条件相对应的一个中性概念，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sup>4</sup>

分别以特拉西和马克思为源头，西方学术界形成了意识形态概念史的两条路径。起源于法国的乐观理性主义路径以启蒙运动为开端，得到迪尔凯姆等人以及结构主义学派的发展。这一路径强调社会意见的一致本性，认为运用理性和通过观察而集合起来的社会观念可以帮助个人认识现实，从而把握真理。起源于德国的批判主义路径，得到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曼海姆和哈贝马斯的发展。这一路径强调的不是人对客观世界的经验观察，而是行为者能动性地创造真理。社会由相互紧张的矛盾充斥着，而非由稳定的一致同意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一路径不相信存在可以认识真实世界的客观标准，而倾向于构建一种融贯的真理体系。<sup>5</sup>

## 二、传统西方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

关于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西方学术界可以分为“价值说”和“工具说”两种观点。第一类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政党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目标。譬如，如英国学者埃蒙德·柏克认为，“政党是一些人基于某些一致同意的原则组织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团体”。<sup>6</sup>欧洲政党研究学者彼得·梅尔（Peter Mair）认为，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处于政党认同中心地位的一套观念系统。<sup>7</sup>安德里亚·沃根斯（Andrea Volkens）认为政党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何为政党”的追问，是政党核心理念的抽象概括，它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宏观的方向指引。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便没有存在的基础，也无法在现实的政治情境中去推行任何政策。<sup>8</sup>

另一类学者则从经验主义的判断出发，认为意识形态仅是政党实现其他利益的工具。熊彼特、唐斯、萨托利、阿兰·威尔、戴维·杜鲁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政党视为“通过集体行动以便在竞选中取得政权的团体”。在这种政党概念模式下，政党意识形态便是政党进行选举动员的一种工具。政党可以利用意识形态最大化其对选民的占有份额，也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维持选民对该政党的兴趣。意识形态可以激发政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以及在政党与公民社团之间构建桥梁。意识形态还为政党精英和普通选民在解读选举议题时提供了一份概念地图。通过意识形态的导引，精英和选民都节省了在具体议题上辨别政党立场的信息成本。<sup>9</sup>

政党意识形态的兴起与政党组织结构的变化关系密切。在19世纪上半叶政党最初在欧洲出现的时候，政党是由议会中政见相近的议员联合而成，法国政治学家迪维尔热称其为精英党或者权贵党。精英党党员人数较少，主要由议员及其亲信组成，没有基层组织，结构简单松散，也常常处于变动之中。精英党的主要活动是依靠其精英党员的社交网络，通过地方选举将其代理人送入议会，<sup>10</sup>因此，精英党不需要意识形态，甚至反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造成的社会动员可能会影响到精英党对地方选举的控制，所以精英党对意识形态

态及其推动的公众参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在欧美的全面扩展催生了新型的政党模式，迪维尔热将其称为群众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在议会外生成，以社会动员为目标。群众型政党在全国和地方层面都形成了严密和完整的组织，并发展了为数众多的党员和辅助性组织系统。<sup>11</sup>在这种新型模式下，意识形态很容易同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结合起来。一方面，意识形态可以巩固庞大的党员队伍对政党的忠诚，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还可以帮助政党扩大其社会基础和实现其对政治社会的整合策略。

对政党意识形态的简单划分是左与右。一般来讲，左翼意识形态倡导激进变革，主张自由、平等、友爱、权利、进步和国际主义，右翼意识形态倡导维持现有体系，主张权威、等级、秩序、责任、传统和民族主义。参考美国学者弗朗西斯卡·维沙露（Francesca Vassallo）和克莱德·威尔科斯克（Clyde Wilcox）的分类，我们可以对政党意识形态进行略微复杂的划分。根据意识形态从左到右的谱系排列，分为左派自由主义（left-libertarianism）、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右翼权威主义（right-authoritarianism）。左派自由主义信奉价值观念的多元主义，把现代化的拥堵生活方式作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追求生态环境的正义与和谐。共产主义坚持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主张社会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社会主义则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强调议会道路和对资本主义进行温和改良。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大规模干预。基督教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点主张有诸多相似，区别在于其与基督教组织及其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右翼权威主义则是一种较为激进的保守主义，在政治治理模式、社会排斥性、民族主义、道德传统主义和经济分配方式等方面持更为激进的观点。<sup>12</sup>

### 三、选举技术成为西方政党的新型意识形态

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却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选举技术正在逐渐打破传统的意识形态分野，而成为西方政党所共性的新意识形态。支撑这一判断的事实有三个：第一，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西方政党努力淡化其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纲领上都宣称自己不仅代表某一社会阶层，而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公众。这一点被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描述为政党向全方位型（catch-all）的转变。基希海默尔在描述全方位政党的特征时，五个特征的第一点就明确指出，“政党意识形态的包袱在明确减少”。<sup>13</sup>新的政党意识指向具体问题，而非某一主义。这种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就是抛弃传统的意识形态，而将选举技术和执政技术置于意识形态的位置。

第二是政党选举活动的职业化。传统的选举活动依靠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来进行社会动员，现在的选举活动依靠职业的选举团队和大众媒体来进行动员。候选人可以雇佣专门的选举团队为其服务，选举团队可能不是该党党员，也不一定是其主张的支持者，只是完成一个以选举活动为内容的订单而已。电视或网络媒体也取代了传统动员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可以把用商业化包装出的政治信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传递给公众。盎格鲁·帕尼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用“选举职业型政党”（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来描述政党的这一变化。在这一新型政党模式中，指引和推动政党活动的不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选举活动所要求的一系列专业技能，诸如民意调查、公共关系、广告营销、新闻传播和电影制作。<sup>14</sup>

第三是政党组织结构商业化。这一点最早反映在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的描述中。卡茨和梅尔将政党发展的新型模式总结为“卡特尔政党”（catel party），这一描述明显把政党看成一

个力图获得垄断地位的商业组织。政党从国家获得公共活动的资源，并试图实现统治地位。<sup>15</sup>乔纳森·霍普金（Jonathan Hopkin）和凯特瑞那·保罗西（Caterina Paolucci）则更为直接地使用商业公司型政党（business-firm party）这一称谓来描述政党的这一变化。这一政党模式完全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其组织和主要资助往往与某一巨型财团有关。这种类型政党的领导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企业家，其代表就是意大利力量党的贝卢斯科尼和泰爱泰党的他信。商业组织本身非常排斥传统的意识形态，所以该类型政党在政治动员时主要利用领导人的魅力和其在新闻媒体上的专业技术。在这一意义上，商业化就是技术化。<sup>16</sup>

选举技术在今日的意识形态地位，实质上是熊彼特传统的延伸，是意识形态工具论的胜利。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把政治家看成政治公共产品的生产者，把民众看成政治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而政治过程就是一个政治企业家争夺选民顾客的市场过程。这种竞争性精英主义的民主模式本身就排斥任何固守的意识形态。如赫尔德评述的，熊彼特把民主的作用视为掌权者地位合法化的途径，而投票本身就应该一种信仰。<sup>17</sup>换言之，在熊彼特的思维世界中，选举技术本来就应该是政党的一种意识形态。

选举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西方社会中公众对固守某一政党意识形态的反感，也反映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对政治社会的重新主导。客观而言，在一个“只讲问题不讲主义”的后形而上学社会中，政治安定、社会和谐和人民福祉看起来可以更容易实现。然而，将技术至于一种神话的地位，这似乎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极端。如戴维·赫尔德所言，技术统治的问题是，在技术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们可以控制和歪曲公民的政治意志。<sup>18</sup>熊彼特的技术主导论夸大了政治精英们人为制造大众意志的程度，而没有尊重人民的价值、信仰和他们思考问题的实际框架。正如萨托利对技术统治的批评，民主政治的一个极端便是，“有专家设计的没有民主的统治”。“成问题的是理性主义的科学物理主义翻版，是它的自信、自大，最后还有无边的欲望。... 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 唯科学主义是侵略性的科学。”<sup>19</sup>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技术维持我们的生存，也使我们盲从于它的机制。

#### 四、补偿纲领、合法性与非政治化

对技术统治的进一步分析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中寻找灵感。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镇，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论见长。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地位批判是其批判理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霍克海默最早将意识形态批判的矛头指向近代启蒙精神中的理性原则和人类中心主义。在《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霍克海默指出，科学与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一样，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sup>20</sup>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一方面，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社会控制和调节系统中，因而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权力形式，技术理性变成了政治理性，技术体系变成了政治体系，科学技术变成了使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因此，“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也许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sup>21</sup>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之所以能够和政治进行融合，关键在于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超越具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先验性，而这种技术的先验性就是政治的先验性。

哈贝马斯是意识形态批判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综合了马克思、韦伯和马尔库塞的观点，对科学技术

作为新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原因进行了深入阐发。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并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形式。而且，哈贝马斯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于新意识形态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晚期资本主义使用补偿纲领来缓解合法性危机。补偿纲领的实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再分配等手段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二是营造一种技术至上的公众意识，促使大众的非政治化。哈贝马斯更为深刻地指出，技术统治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抹杀了实践和技术之间的差别。实践属于社会文化的生活领域，是政治制度框架形成的基础，其立基于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活动之上，而技术属于社会劳动的生产领域，表现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技术统治消解了政治领域的实践问题，力图把实践问题化归为技术问题，通过技术方式来回避或掩盖实践问题。<sup>22</sup>

客观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统治的批评是深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便捷，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深入地剖析了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征与实质：科学技术以非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并成功地掩盖了它的意识形态本质；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并渗入大众的各种意识观念之中，任何人都很难抗拒它的影响和控制；技术统治通过其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及其对大众的补偿政策，换取大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可和忠诚。它将自己的辩护标准非政治化，并使之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sup>23</sup>

结语：技术统治的补充？协商民主的可能？

西方国家中政党技术统治的主要形式是选举民主和精英民主。尽管精英民主可以通过补偿纲领消除社会的分配失调，但是政党精英主导的补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家长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尽管选举民主可以用选举程序为政党统治附加合法性，但是选举的过度程式化导致了公众参与热情的消弭，从而会逐步瓦解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从根本而言，政党社会关系的调整不能仅仅通过技术和策略来完成，而需要通过政党与社会间的协商和对话来进行。政党技术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视界的单一，其解决的办法则是视界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这便是协商民主在西方社会兴起的背景与情境。协商民主可以培育活跃的非正式公共领域以弥补选举民主中公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协商民主从根本上关注的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试图通过在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内的自由、平等和理性协商，把公民的参与热情激发出来。换言之，立基于交往活动之上的协商民主，试图把技术统治消弭的实践问题回归到政治生活当中。

当然，协商民主的进一步推进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才可以真正地发挥制约技术统治的功能。目前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明显的进展，譬如哈贝马斯关于双轨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史密斯和威尔斯对公民陪审制度的讨论，菲什金关于协商民意调查的调查研究、阿克曼对公民协商日的提议等等。<sup>24</sup>可以发现，西方学者正在通过对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研究，以及协商民主与现存的政党代议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消解技术成为政党意识形态之后的问题。当然，西方学者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重要的缺失，即试图绕过政党来发展公民主导的协商民主，这一倾向使得西方的协商民主更多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实际上，公民以及公民社会要充分地进入政治领域的讨论，仍然离不开政党的中介作用，因此，协商民主的发展仍然需要回到政党以及政党制度上来。只不过，公民社会要设计更为复杂的制度，以限制政党和国家利用政治技术实施更为隐蔽和柔性的统治。

## 注释

125 [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423郑晓松《技术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6、117-120页。

6Edmund Burke, *Edmund Burke on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Hassoceks: Harvester Press, 1975, p. 113.

7Peter Mair and Cas Mudde, "The Party Family and its Stud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1, 1998, p. 220.

8Andrea Volkens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Parties, Ideologies and Issues," in Kurt Richard Luther and Ferdinand Muller-Rommel e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4.

9Ian Budge, "A New Spatial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Ideology and Policy Equilibria Viewed Comparatively and Temporall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4, vol. 24, pp. 443-467.

1011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54, pp. 1-2, pp. 61-62.

12Francesca Vassallo and Clyde Wilcox, "Party as a Carrier of Ideas,"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Crotty ed.,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 412-421.

13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Europe Party System," in J. Lapalombara and M. Weiner, 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66.

14Angelo Pane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64

15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995, No. 1, p. 5.

16Jonathan Hopkin and Caterina Paolucci, "The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zation: Case from Spain and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9, Vol. 35, pp. 307-339.

1718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19[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6、498页。

20[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21[德]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6页。

22[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4[南非]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编《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118页。

On the Rise of Electoral Technique as Party Ideology in Western Countries

Gao Qiqi

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

[\[关闭窗口\]](#)